学林

（上接9版）

虎胡同平民大学，被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聘为“艺术概论”教员，讲述东西方艺术，此外，他还可能在朝阳大学任教，在燕京大学演讲。可谓相当活跃和努力，既在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也聊补了北大薪水之不足。

至定居上海和杭州，作家通过写作和编集，版税收入大大增加，收入基本可控，故各校教学都只兼职，也渐渐脱离了大学教书这个“最苦的职业”。

“这一般知识欲很旺的青年，都成了他的亲爱的兄弟了”

对郁达夫来讲，“教书”是有限的职业，而“育人”是无限的责任。

郁达夫“热情，旷达，博学多才，不修边幅，喜欢热闹，爱交朋友”（谢冰莹《追念郁达夫先生》），其率真和热情，使他能与各色人等友善，他对朋友侠肝义肠，他也让自己形色通透，毫不掩饰个人的喜怒哀乐，加之在文坛“辈份”崇高，这样的郁达夫自能博得善良朋友的信任，尤其被年青人尊为师长，被簇拥和爱戴，“凡是和郁达夫先生有过交往或曾经会见过他的人，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抱有好感的”（孙席珍《怀念郁达夫》）。

各地教书期间，同事和同学，是他友人榜上的主力。现有史料留下了太多郁达夫与同学郊游、与师友喝酒的文字，一起看电影、观展览、逛市场、逛旧书摊的记录。比如1929年在安庆，只短短一周，10月1日，“偕同学数人上东门城上走了一圈”；10月5日，“晚约旧友吃饭”，10月6日，因“闻有通缉之令”（洪传经《郁达夫先生授书安大，闻有通缉之令，匆促出奔，诗以送之》）而“仓皇出走”，这次“安庆之难”以“事前告知，得脱”，出手相助者正是十年前北京旧友邓仲纯（《青岛杂事诗》第五首注，《避暑地日记》1934年8月3日）。这是一种让人珍视的友情。

尽管讲台上的郁达夫上统计课、上英文德文、讲欧洲革命，很多时候与文学无关，但作为“师者”的郁达夫，面对更多慕名而来的各地文艺青年，向他们传授最多的无疑是创作心得与鉴赏经验。

达夫最喜欢做东，而且是强迫式的；我们只得依他的落座处，围着坐了，听他讲诗。（黎锦明《纪念一位抒情文学家》）

他从不以名作家自居，与身边的年轻人“亦师亦友”。比如在北京：

北平的青年人到达夫兄处来谈天的也真多。但同他往来最多的，还要算我、炜谟、冯至、柯仲平、赵其文、丁女士诸人。到末后才有姚蓬子、潘漠（漠）华、沈从文、刘开渠诸兄。他对我们一律都称之为“同学”。我们有时一大群的，谈晚了就横在达夫兄的床上过夜。（陈翔鹤《郁达夫回忆琐记》）

看得出来，郁达夫与年轻人的交往是一见如故、亲昵无间的，陈翔鹤、黎锦明们描述的场景应该是发生在郁达夫身边的常态。这样的场景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时有呈现，比如这段文字，简直是郁达夫的夫子自道：

学生对质夫的感情，也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。吃过晚饭之后，在学校近旁的菱湖公园里，与一群他所爱的青年学生，看看夕阳返照在残荷枝上的暮景，谈谈异国的流风遗韵，确是平生的一大快事。质夫觉得这一般知识欲很旺的青年，都成了他的亲爱的兄弟了。（《茫茫夜》）

最知名的一次会友，是1924年11月13日专程看望来京求学、生活无着的文学青年沈从文，予以物质资助，还介绍给《晨报副刊》编辑。是晚，并完成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，刊发于《晨报附刊》，引起很大反响。

而据刘开渠的回忆，郁达夫第一次探望还扑了个空：

有一天我到了达夫先生的住处，未等我坐下，他就告诉我：一位从湖南来的青年给他写了一封信，是来北京投亲靠友的，可亲友都不认他，处境十分困难，住在一个小旅馆里，并说：“走！陪我一同去看他，我请你们一起去吃饭。”我们赶到他住的小旅馆时，他却不在。（刘开渠《忆郁达夫先生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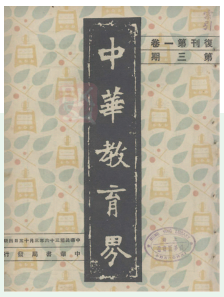
可见郁达夫提携后生的全心全意。不能不说，沈从文文学天赋的展开，与郁达夫的倾情助益和积极鼓励不无关联。

如果把以郁达夫为师的“同学”的名字列在这里，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，张友鸾、冯至、陈翔鹤、陈炜谟、刘开渠、沈从文、柯仲平、赵其文、丁月秋、孙席珍、潘漠华、刘大杰、胡云翼、温梓川、张白山、张曼华、黄药眠……这个不完全统计中，有未来的小说家、诗人、学者、翻译家、画家、雕刻家、书法家、编辑、记者、出版人、电影艺术家，也有大量的建设者和革命者，都是才华横溢，激情四射，至得益于郁达夫的言传身教，奋力提携，他们中不少人其时已崭露头角，日后更成就非凡。而且我想说的是，即便是一所学校，能有这样一班队伍整齐、成就出众的校友，也足令其骄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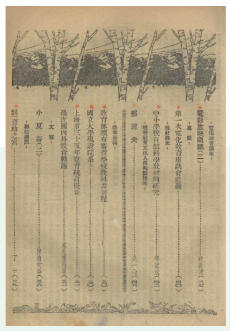
《大学教育》

万有版《文学概说》

万有版《戏剧论》



《中华教育界》杂志


吴一心《郁达夫》目录页

吴一心《郁达夫》正文页

丰富而不重复的“艺术的生活”

郁达夫是特别重视个人体验、强调生活积累的“私小说”作家，那种“生活和艺术紧抱在一块”的写作状态，使得他的文字特别能呈现个人生活的精彩瞬间和真实历史。丰富而不重复的生活经历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和素材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我们发现，不断的迁徙、流离和奔波，似乎是郁达夫一生的宿命。他好像很难在一个城市住满5年以上，除了富阳故乡和上海；而大学教书，也很难在一所学校持续哪怕是一年。北大有三个学期，但也从经济、法律辗转到了英文系（参《北京大学日刊》1924年10月6日第1536号）。直如作家所自称的“屐痕处处”。或许，正是这样闯荡、放浪和不安于一隅的“艺术的生活”，给了作家“自叙传”的全部底气和力量。

所以教书育人，尤其不断变换学校、学科和学生的教学生涯，作为作家体验的一种职业生活，作为遍历人事沧桑、捕捉创作灵感、拓展写作空间的一种独特的“手势”，将为郁达夫开启一个特殊的题材领域。

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是郁达夫的首个教学“基地”，孕育了郁达夫多部不朽的作品，包括《芜城日记》《茫茫夜》《秋柳》《茑萝行》等。这里两个学期的教学和生活，可分别以《茫茫夜》和《茑萝行》为代表。两部小说都以军阀干政、时局动荡的A省省城为背景，前者表现一个初到学校即侧身校园风潮的单身教师的恍惑与迷乱，最终只能以满足病态欲望来抵御茫茫的长夜；后者则因带了妻子“同往A地”，不久又加以“悲哀的继承者”，主人公在“社会的受难”之外，更感受生活的压力，以至从一个“懦弱的受难者”，而成为家庭里的“凶恶的暴君”。作家真实而艺术地还原了同一校园里，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。这种以个人生活为蓝本的虚构，为“自叙传”写作提供了经典的范本。

北大的边缘状态则唤起了诗人强烈的情感反应。如果说《沉沦》时代的郁达夫是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写小说强说愁；那么处在北大那般门户艰险、等级森严的境地，却是如今识尽愁滋味，“欲休还说”——字里行间的情绪藏掖不住。这个时期各种文字，《薄奠》《十一月初三》《零余者》《海上通讯》《一封信》《北国的微音》《读上海一百三十一号的〈文学〉而作》《给沫若》《小春天气》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《我承认是失败了》和《对话》等，文体不同，内容各异，而其中欲止又言、欲休还说的孤独、伤感和被排挤、被遗弃——那种“零余者”的凄怆和忿懑，否定和自我否定，却是随处可见的：

美丽的北京城，繁华的帝皇居，我对你绝无半点的依恋！你是王公贵人的行乐之乡，伟大杰士的成名之地！……——像我这样的无力的庸奴，我想只要苍天不死，今天在这里很微弱地发出来的这一点仇心，总有借得浓烟硝雾来毁灭你的一日！杀！杀！死！死！毁灭！毁灭！我受你的压榨，欺辱，蹂躏，已经够了，够了！够了！（《给沫若》）

这一阶段的作品，注定是郁达夫创作里最特殊的部分。在我看来，郁达夫笔下“零余者”这一人物标签，是在北京被验明正身的，被从那些虚构的、模糊的、基于概念的艺术形象身上剥离下来，而成为作家真实的、清晰的、触手可及的体验和存在。从这些文字，我们自能联想诗人在这座最高学府感受的不平和屈辱；也只有将这些创作捉在一起阅读，郁达夫那段被“银弟”带偏了的北京生活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还原。

当然，综合来看，教书生涯赐予郁达夫的灵感是丰沛而多元的。比如在声称“一个字也不写，一篇文章也不做”的武昌，尽管创作不丰，但大量由讲义结集的学术著作，《小说论》《戏剧论》《文学概说》相继出版，而他对诗，对小品文，对日记文学、传记文学，也都有自己的见地，想必是教书这一职业赋予郁达夫的文学产品，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抒情文学家、一位感伤诗人思考深入、学理缜密的一面，学养丰厚、知识宽博的一面；而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中大，诗人的革命欲望被深刻启迪，其后的文字亦随之发生深刻转型。他开始对“革命社会”作冷静的批判，对“革命文学”作热情的推介，大力倡导

（下转11版）